

江河改道对区域社会形成和转型的影响

□ 钱 杭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 上海 200234

在江河流域型区域社会的形成过程中,大江大河干流走向的摆动及改道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第一大河长江的干流对安徽无为、江苏扬中及靖江等区域社会的影响是“非人为自然改道”的实例;位于长江三角洲南翼的浙江省东部地区的浦阳江,虽然作为浙江(钱塘江)支流,流域面积仅3452平方公里,为长江下游流域面积12万平方公里的3%,但其干流的走向及改道,则是“人为改道”的实例,对沿江区域社会(如萧山、绍兴等)的形成与转型特点,产生了更为重要的影响。

据考证,浦阳江下游主河道的走向,在历史上“经历了散漫北流、东流借道、改道复北三个变迁过程”;但据考古资料和传世文献记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浦阳江下游的实际走向并不是“东流借道”,而是“东流”,即从诸暨经西小江,然后由三江口(今绍兴斗门镇)入东海(文献上多称其为“后海”)。

浦阳江下游河道的改道,是元、明两代拓宽碛堰、筑坝麻溪后的结果,从此,浦阳江改经碛堰、渔浦入钱塘江,成了钱塘江的支流。《清史稿》说得非常正确:浙江西北自富阳入,浦阳江西南自诸暨入,合于渔浦街。古时浦阳与浙江阂,后开碛堰始通。其具体的流经态势是:(钱塘)江入县界,经虎爪山北,浦阳江自东来注之,至渔浦折而西北流经历山、半月山之西,至浦沿后折而东北,经西兴镇,又东北流,合南沙各乡之水入于海。

吸纳了浦阳江以后的钱塘江,水势已远过上中游的信(新)安江、富春江,对宁绍平原西部地区的水情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萧山县治以东、以南的浦阳江下游流域内,则形成了一个派生或主要依赖于浦阳江下游水系的潟湖型湖泊群,因其所在位置主要在县城以东、以南,故可将其略称为“县东湖泊群”。

浦阳江下游主干河道的改道,进一步加速了浙江入海口形状的变迁,构成了萧山县西湖泊群、县东湖泊群兴衰存亡的自然背景;加上人口压力下的湖

田需求、闸坝建设、业态竞争等因素,两个湖泊群都将不可避免地面临废弃和成陆为田的历史命运。当然,这还需经过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随着浦阳江改道入浙江,县西湖泊群会达到一个发展的高峰;同样,随着浙东运河水量与航道的变化,县东湖泊群也会得到运河水系的补充(浙东运河问题,事关另一组自然与人为因素,不便在此文中展开,故略提一笔,暂且搁置)。

在两个湖泊群中,凡是规模较大、维持时间较长的湖泊,都具有与外部水网、相邻水系连通的特点。如后世形成的水库型湘湖,虽然位于县西湖泊群,且在建设时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却经由不断的改良,利用周边原有河道,实现了与县南浦阳江和县东运河的相连,建立了由若干座启闭有序的堰闸连接起来的一个“库域”型水利网络,有效地扩大了共享范围,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废弃的过程。

由于浦阳江比钱塘江距萧山县治更近,其下游主干河道与县南、县东各水流之间,就构成了一系列复杂的关系。

虽然历史地理学家对浦阳江下游主干河道是否及何时经历了“散漫北流、东流借道、改道复北”的过程,以及这一过程对诸暨、萧山、山阴、上虞等相关区域的利弊影响还存在不同的理解,但对一个基本的事实则没有太多疑问——自明中期以来,靠官帑民建拓宽碛堰、筑坝麻溪后,浦阳江下游的主干河道已不再是西小江至钱清江,而是从临浦西折,在浦阳江原有西行支流(即所谓新江,或渔浦新江)的基础上,经渔浦汇入富春江和钱塘江。嘉靖《萧山县志》所述大体正确:“今开碛堰以通上流,塞麻溪以防泛滥,而江分为二。”“今……塞麻溪”没有问题,“今开碛堰”则不够确切,因为嘉泰《会稽志》已提到过有一座位于萧山县城以南30里的“堰”,名叫“碛堰”,说明其并非“今开”,而是早在南宋嘉泰元年(1201)以前就已经存在。由于文献缺乏,有关“碛堰”的开通历史,已难以准确追溯。

这就说明,明中期的“开碛堰”,不是嘉泰《会稽志》记载的萧山堰坝之一的“碛堰”,而是一个综合性的浦阳江下游改道工程,包括“开”通临浦镇西面的碛堰山,筑坝“塞”住临浦镇东面的麻溪,从而断开西小江;也就是嘉靖《萧山县志》所说的“开碛堰以通上流,塞麻溪以防泛滥”。这一改道工程完成时达到的规模,已绝非在碛堰山修建一个堰坝所能比拟。因此,文献上记载的不同年代,应该是泛指该工程所经历的规划、批准、启动、施工、竣工等阶段中的某一个或某几个阶段。

若以某一时间节点对“开碛堰”作大致的标志,或可选用戴琥任职绍兴太守的中期,即明成化十三年(1477)。

对整个浦阳江下游改道工程具有重要意义的麻溪,又名进化溪,发源于今萧山境内大岩山东麓龛斯岭,流入西小江。由于麻溪上游“为溪流性砂卵石河床,且两岸山体集雨面积近乎相等,如遇暴雨,则洪峰时间集中,洪峰流量骤增,因此水位暴涨暴落,水患犹多”。在西小江流域,麻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中转性隘口。

若以某一时间节点对戴琥完成麻溪坝修筑作大致的标志,或可选用戴琥撰《绍兴府境全图记》的明成化十八年。这一年也可用来标志浦阳江下游改道系列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的时间。继戴琥之后,山阴县令张焕于明正德年间“令民筑塘捍海水,建扁闸,蓄泄以时,自是少水患”,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解决西小江以东低洼地带的旱涝无常问题。明嘉靖十四年(1535),汤绍恩出任绍兴知府,经实地考察,发现位于钱清江、曹娥江、钱塘江滨海交汇之处的三江口有两座山,一为彩凤山,一为龙背山,两山间的峡谷颇宜设闸,于是决定开展工程,次年完成。作为三江闸工程的配套设施,汤绍恩在上游地区扩宽浚深碛堰附近的河道,加大浦阳江的出水量;在新河闸附近修筑茅山闸,涝可泄天乐乡水,旱亦可引浦阳江水。此外,又在三江闸内修筑平水、泾娄、撞塘、蒿坝清水诸闸以调节水量。最后在闸外修筑了一道三江石塘,对全闸进行保护。

三江闸水利体系建成后,成为控制萧绍平原水系的总枢纽,它与横亘数百里的萧绍海塘连成一体,切断了西小江的入海口,使萧绍平原 80 余万亩农田成为旱涝保收的膏腴之地。三江闸开创了萧绍平原水利史上建设沿海大闸控制水利形势的新格局。据测算,该闸平均泄量为每秒 280 立方米,可使萧绍地区 3 日降雨 110 毫米而不成灾。

汤绍恩主持的三江闸及其配套体系,结束了山会平原直接通海的历史,大体解决了自南宋嘉定年间鉴湖侵废后山会平原面临的水利难题,结束了浦阳江下游对萧绍平原农业的不利影响,一定程度上

标志着萧绍平原水利网络的正式形成。

萧山西江塘的加固和江塘闸口的完善,对于湘湖具有直接的意义。即便不能如府志所说“邑人始免水患”,但就减轻、减缓湘湖的淤塞,解除沿江居民生活环境面临的巨大威胁而言,显然具有正面的作用;尤其是可以防止因“已田坍江”形成的对湘湖的报复性破坏。

历史的吊诡处恰恰表现在,浦阳江下游改道给萧山带来的“西江水患”,因对西江塘堤坝的加固和设施的完善而获得有效缓解,却使得位于湘湖南端、本来就不属于湘湖库域核心部位的安养乡、许贤乡部分农田进一步脱离湘湖,进入改道后的浦阳江水利范围。

对于湘湖史来说,这一转变具有的深远意义,是改变了湘湖“守成期”所赖以维系的基本供求关系。如果湖水有效供给不足,一般会从反面刺激、调动水利集团的积极性,同时还会提醒有关方面尽快改善、弥补已经表现出来的某些制度性漏洞,以防局面进一步失控;而对湖水充分需求的萎缩则不然,它必将终极性地改变一个水利集团赖以形成并得以长期维持下来的最基本的利益结构,这是水利集团走向解体过程中更具决定性意义的一股力量。浦阳江改道工程以及西江塘的修建,就导致了这一结果。

因此,浦阳江下游西向改道、三江闸修建、西江塘加固等系列工程的完成,对湘湖的影响可谓至深且巨,推动并标志着湘湖守成期的正式结束。

清代道光朝 30 年,咸丰朝 11 年,同治朝 13 年,光绪朝 34 年,在这 88 年间,上、下湘湖及白马湖区域发生的最大问题,就是因为位于萧山西境的西江塘的决口而导致的湖区淤沙。而这一点则与富春江水势的变化有关。这是 83 年间公私文献对西江塘决口及湖塘维修情况的不完全统计。为了维修遭到损毁的江塘和湖塘,萧山地方官员和乡绅乡民应该说是尽心尽力的。

即便如此,三江合一后势头数倍于前的江水,仍顺着与湘湖相通的河道、沟渠随时随意地汹涌灌入,在给萧山人带来无休止麻烦的同时,更造成了湘湖湖体的变化。大规模的泥沙淤积,使得上湘湖自定山前后起至青山张一带,逐渐淤成一片倚山临水的高地,长度五六华里,面积达 4600 余亩。对于生活在湘湖库域范围内的人们来说,这片高地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不仅成了垦、禁之争的焦点,经常影响人们对湘湖本身存在之合理性的判断,而且从根本上推动了湘湖水利集团的瓦解。浦阳江下游改道及其结果,对于区域社会形成与转型特点所具影响之至深且巨,于此可见一斑。

■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年第 5 期,约 15000 字